

本土工程人 ——陳景輝專訪

文/ 海榮

編輯/ 小土



左起：街坊小朋友，陳景輝

天星，已成為「本土意識」的象徵。所謂的「本土意識」何來？有這樣的一個回應：「我們的本土意識，不是由政府從上而下給我們，而是我們從社會參與中體現出來。」近日保護天星皇后碼頭運動其中一個抗爭青年，陳景輝曾那樣引述。「本土意識」是「爆」出來的嗎？真的那麼重要？或許我們從一個人的成長故事，會找到不少對問題的啓迪。

牛棚的另類教育

就由一個牛棚義工說起吧。阿輝中學時，不時覺得課程很悶，偶然在商務書局拿到一份牛棚書院的課程簡介，開辦甚麼當代德國哲學、性解放、社會學導論等，十分興奮。可是課程學費對於他來說還是頗貴，有幸在老師介紹下，在牛棚書院當起義工，以勞力作為進修另類課程的學費。所以，「牛棚書院，棒。」可以學到學校裡學不到的知識，在裡面又遇到一班志同道合的人搞活動、開讀書小組，「好像進入了香港的另一個時空做著與別不同的事。」阿輝還認為有種「知識下放民間」、很草根的味道呢。

而其中講者的一番話，更改變了阿輝的未來他。「我記得在一次牛棚的公開論壇上，當時郭恩慈話，牛棚書院的出現會否不過是一班藝術家、知識份子的空降，反而剝奪了屬於一個土瓜灣居民的空間。牛棚書院不是已很解放嗎？竟然這是空降社區？」他疑惑，他被受刺激。但從此，他開始反思社會空間與當地居民的關係。

利東街重建的關注運動

後來，阿輝有機會到灣仔聖雅各福群會工作，並參與關注利東街（喜帖街）重建和灣仔可持續發展的運動。最初他只當參與社區工作，好像搞文化旅遊，自己則充當導遊，帶領學生認識香港舊區文化。正是長時間對喜帖街重建的關注，阿輝對社區的認知和情感，就在那裡點點滴滴孕育出來。

「帶舊區旅遊是很開心的，你會發現居民有很多創造力，很有趣。當地的老街坊會說利東街的歷史，檔販會說自己的生活故事，好 dramatic。裁縫老闆就說他們以前是怎樣幫妓女做旗袍。有時，有些店舖的生意好，就會把部分生意交給他商戶，他們之間很和衷共濟，街坊互相認識、關懷，當每一個人就好像親人。他們長居此地方，這是他們熟悉的地方。。」這就是舊區的「人味」。

可惜，本來平常不過的利東街，因為市建局計劃興建一個連體商場，居住在那裡的人命運也隨之劇變。

當地許多居民根本不想離開利東街。「他們的訴求很簡單，就是在他們住開的地方生活下去。對於小商戶來說，他們所做的就是本土經濟，他們害怕一旦搬離喜帖街，生計難以存續。」阿輝又激動地表振示，儘管早期華人在那裡生活做生意，沒有甚麼規劃，「利東街的形態是他們自己搞出來的，有自己生活的痕跡。」政府回收土地，就任意把居住在那裡的人趕往其他區、其他街。可是，當這一班人解散後，這個地區的歷史和那班人對地方的感情也同時被解散。

為何明明喜歡自己的社區，想把生活延續下去，為甚麼要保留屬於自己的地方是那樣困難？「政府的行為是粗暴的。他們在清拆舊區時，例如與居民訂下保密協議，不准他們對其他人講自己若接受收購可以獲得多少賠償，以金錢分化街坊。重建利東街時，當局把舊街搞得破破落落，彷彿舊街舊樓是非拆不可。他們會用牛皮膠紙在窗上打大交叉，鑿穿回收房子的後牆，又用大鐵鍊扣大鎖。同時，他們不會清理垃圾，地舖又沒有照明系統。由於擔心治安問題，居民要求在大廈建設一閘門，當局又以違反消防條例拒絕。有些街坊怕子女有危險，已不讓子女

獨自出入。」

這幾年來，爲了利東街，爲了舊區，不少人付出了極大努力，仍不敵政府一意孤行。「我們給政府的信過百封，爲傳媒寫文章不下一百篇，搞文化旅遊團過百次，換來的是政府在沒有回覆的情況下就拆這條街。」

大規劃小人情

阿輝亦身體力行「落區」，搬離新市鎮公屋，遷居油麻地的唐樓。典型的新界新市鎮，處處都是高樓、商場，一道又一道天橋連接著屋邨與商場。居住其中的人互不相識，關係冷漠。在新市鎮人們不會見到小販，只見超級市場，還有私營化的商場，一切規劃得井然有序。一個沒有性格的社區。

在舊區生活，反而找到已失落的和諧倫理。「現今油麻地，仍有老店老舖，有唐樓、有小商販、還有大排檔。大家關係融洽，記得有次去茶餐廳吃飯帶不夠錢，侍應對老闆說『熟客來的，等他明天來付錢吧』。就是這一種關係，在新市鎮是很難找到的。」

可是，對舊區的關懷，好像總不是當局所關注的事項。「舊區的老店，不過是市建局重建計劃受影響的租戶的幾多份之幾。社區文化是很重要。在香港有誰沒有見過大排檔、唐樓、士多？但是現在香港政府所做的有時太目中無人的，他們不會理會的社區生活文化與歷史的重要性。政府的重建沒有把『人』這因素放在內，思維仍是很 colonial。說甚麼 **develop**，**develop** 是甚麼意思？發展爲甚麼不可以是慢慢成長的。」拆拆拆。我們好像已忘記了一個社會一個社區一個人應是怎樣成長。

阿輝說，最怕是人們的生活都只能成爲記憶，原來的生活無法延續，熟悉的環境跟身處的現實彼此分裂。居民的生活尊嚴要得到平反，地位應受到尊重。所以，阿輝極力參與社區運動爭取社會上的迴響。

殖民意識帶不走

「現在的社會氛圍很壞，周圍有很多火頭。」從利東街重建到天星事件，時間在變，政府思維卻沒有變。「這是民主的問題。政府蔑視被管治的人。要重建拆卸一個區域時不會同你傾，城市規劃不會讓草根居民參與，更沒有通過他們的生活經驗來作規劃。」而天星事件，正突顯出政府和人民在發展與保育問題上的落差。

「政府以為用「補償」就以為可以解決一切問題，所有東西化作金錢買賣，土地可以補償；拆毀了文物，就抽取某部分組件模仿一次給人看。這是一個多麼扭曲的時代。」

殖民者已走，但最危險的是殖民的思維仍未解除。「我看過二十年前《廣角鏡》的一篇文章，內容是分析六七十年代戴麟趾時期，香港沒有民主，香港人對政治冷漠。到了八十年代尤德時期，政府不再用上一代的語言向市民交待，因為八十年代香港人民主意識已經高漲。我心想，**我們的意識高漲和政府的管治意識是否開明是沒有關係的，因為尊重民意、尊重歷史是政府的責任。**在天星事件中，政府沒有收集意見，就直接把責任推給人民，政府管治出問題因為你們的公民意識薄弱。我們要拒絕這些意識，這些意識是殖民者遺留下來的，只是用作合理化它的封閉。」

香港人的本土意識，並不是政府施予的。「我們常會聽到社運前輩說香港人的本土意識，是在七十年代一連串社會上如保釣、中文運動等事件慢慢形成。我認為陳順馨（嶺南文化研究系教授）所說的更為精確，『**我們的本土意識，不是由政府從上而下給我們，而是我們從社會參與給我們的。**』參與社會運動讓我們肯定了自身的主體性，都市空間應由我們共同決定，不只是官方的一方規劃。」

「我們成長在高廈林立的年代，空氣污染、商場越來越多，我們對這個城市的熟悉感已脫了鉤。城市急速變化，我們的生活經驗已變得單一，傷害深遠。這就社區為何重要，天星事件得到廣泛認同的主要原因。這是我們城市需要珍重的。」

而藉著參與社會運動，給予人們由下而上的本土想像。從大敘述（官方都市想像）中表達民間的否想。參與，正是身份的形構過程。

認真面對過去才是最重要「我們要重新檢視殖民地的歷史，我們要知道香港社會是怎樣走出來的。這是一個空白。社會運動講的人權公義自由，都是一些普世價值，但是，它的根源是什麼，這只有認識我們的歷史才能解釋的。」

「殖民地歷史和經驗需要重檢，我們才知道我們的位置。」阿輝就以這句話結束了訪問。也許，我們不是沒有歷史，而是我們沒有認真對我們過去的歷史檢視和反思，而利東街重建、天星碼頭事件尚未句號，因為真正的「工程」，現在才開始。